



大司空类型陶罐

2021 年 4 月至 9 月，为配合青兰高速涉县至冀晋界段改扩建工程顺利实施，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邯郸市文物研究所、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涉县文物事业服务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涉县王家岗遗址实施了抢救性考古发掘。

王家岗遗址位于涉县涉城镇寨上村东偏南约 0.4 公里，清漳河北岸的高合地上，遗址背靠韩王山，面向清漳河，现存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共计发掘墓葬 4 座（含瓮棺 1 座）、窑址 2 座、灰坑（窖穴）54 个。出土器物材质涵盖陶、石、铜、骨、蚌，完整或可复原器物 50 余件，其他标本陶片 300 余片。陶器器类有钵、碗、灶、釜、罐、支脚、缸、环、甗、甗、瓮、豆、壶、甗、舟等，石器有穿孔刀、斧、铲、凿、石片等，骨器有锥、簪、匕、蚌器有镰、穿孔饰件等。

王家岗遗址地层堆积较为简单，①层为近现代层，②层为金元时期，所发现遗迹单位均为②层下开口，根据出土遗物，可知该遗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内涵丰富，包括新石器、夏、西周、东周等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发现的新石器时期及夏时期遗存最为重要。

新石器时期遗存初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 H46、H51、H54 为代表，出土遗物可分为陶、石、骨、蚌 4 类，早期陶器质地可分为泥质和夹砂两大类，泥质陶以细泥陶为主，火候较高，常见口部呈红色条带，腹及底为灰色的“红顶”钵、碗；夹砂陶以红褐陶为主，陶色斑驳，火候不均，器表常见刷抹痕。器型以釜、钵为主，其次有罐、盆、壶、支脚等。石器有铲、斧、凿、刀等，骨器有骨簪、骨锥，蚌器发现 1 件圭状器，片状、残断，尖部为三角形。文化面貌与石北口早期、下潘汪第二类型、北福地甲类文化遗存相似，可归为北福地二期文化。晚期以 H23、H45、H50、H53 为代表，出土遗物可分为陶、石、骨 3 类，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其次为细泥灰胎红皮陶，少量黑皮陶。可辨器型有钵、甗、罐、盆、瓮、纺轮、环等，石器有铲、球、环、石片，骨器有骨锥。纹饰以篮纹、绳纹、弦纹、刺划纹、弦线刻纹、彩陶常见。彩陶以红彩和紫红彩为主，纹饰以蝶须纹、水波纹、弧三角+平行斜线纹为主，钵碗类口唇部多涂一周红彩，盆类多平折沿，沿面多饰水波纹。所呈现文化面貌与本地区百家村、下潘汪、界段营等仰韶晚期遗存基本雷同，属于大司空村类型。

夏时期文化遗迹发现灰坑 1 个，灰坑体量较大，坑口近圆形，直壁，平底，出土遗物丰富。陶器以夹砂黑皮陶、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泥质红胎磨光黑皮陶也占一定比例。器表除素面磨光外，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弦纹、弦断绳纹、楔形点纹、附加堆纹次之，可见少量篮纹，个别涡旋纹。器型以三足器和平底器为主，可辨器型有甗、甗、罐、盆、瓮、纺轮等；绳纹甗多卷沿薄胎深腹锥状实足，可见个别浅细绳纹夹砂褐陶厚胎深腹小甗残片；甗上部呈深腹盆装，甗腰内有腰腹；罐多呈橄欖形，侈口，束颈，深腹，小平底。颈部以下通体饰细绳纹，器表多附着泥皮，口沿压印花边；釜多为斂口，方唇内折，平底或饼状足；盆敞口，宽沿，弧腹或斜腹，平底。石器有斧、铲、刀、凿、球、石片等，斧呈上窄下宽梯形扁柱状，双面刃；



M2 出土器物组合

铲多为刃部，薄体扁平状；刀有孔，扁平长方体形。骨器以匕常见，尖部三角形，边缘磨薄。蚌器有穿孔蚌环，应为串饰。所呈现文化面貌与磁县下七垣、永年何庄、北羊台等先商文化遗存相近，为典型“漳河型”先商文化。

西周时期文化遗迹有灰坑、瓮棺墓、窑址，出土遗物较为丰富，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少量泥质黑皮陶、泥质黄褐陶、夹砂黑皮陶。陶器制法以轮制和模制为主，纹饰以绳纹占绝对数量，少量弦纹断绳纹、附加堆纹，素面磨光黑皮陶占有一定比例。器型多见甗、罐、豆、盆、瓮等。甗多夹砂灰陶，大部分残片口沿为宽折沿，沿内数周凹弦纹，足为圆袋足，绳纹较粗，为商式鬲血统；也有个别柱足甗，应为周灭商后带来的周文化因素。瓮棺墓葬具复原绳纹小口瓮，侈口方唇直颈微外撇，唇部有一周凹弦纹，约为西周早期，兼具商周两种文化因素。陶窑也较为少见，整体结构保存较好，由操作坑、储灰坑、窑门、火塘、窑室组成。窑室呈圆形，窑床呈倾斜状，北高南低，约 10°。窑床及窑壁根部有凹槽火道，下连火塘，上连烟道，整体设计较为成熟、科学。

东周时期遗存主要为灰坑和墓葬，灰坑均为春秋时期，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可辨器型有甗、豆、甗、釜、罐、盆等，以矮束颈、弧肩、鼓腹甗最具特色，该种陶甗肩及上腹为泥质陶，饰中粗绳纹，下腹及足夹砂陶，饰特粗深痕绳纹，与古鲁营八期、南小汪及葛庄春秋时期陶甗相同。墓葬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早期，春秋晚期墓葬为 M4，长方形竖穴土扩木椁墓，葬具为一椁一棺，墓主头向西北，仰身屈肢，随葬陶盖豆 1 个、陶罐 2 个、陶甗 1 个。战国时期墓葬为 M2、M3，均为长方形竖穴土扩木椁墓，葬具为一椁一棺。M2 椁室北端隔出头箱，头箱内自东向西依次摆放陶壶 2 个、陶甗 1 个、陶甗 1 个、陶甗 1 个、陶甗 2 个。棺内未见尸骨。M3 棺内骨架腐朽严重，依骨架轮廓，应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随葬铜带钩 1 枚、陶罐 1 个。

王家岗遗址年地处冀南太行山腹地，位于漳河上游的清漳河流域，遗址面积较大，延续时间长，出土遗物丰富，是继漳河下游界段营、下潘汪遗址之后，在漳河上游类似遗址考古发掘的一次重大收获，基本建立起了冀南清漳河中游区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杨丙君）



西周时期小口瓮



北福地二期文化遗物（红顶碗、釜、蚌圭形器、石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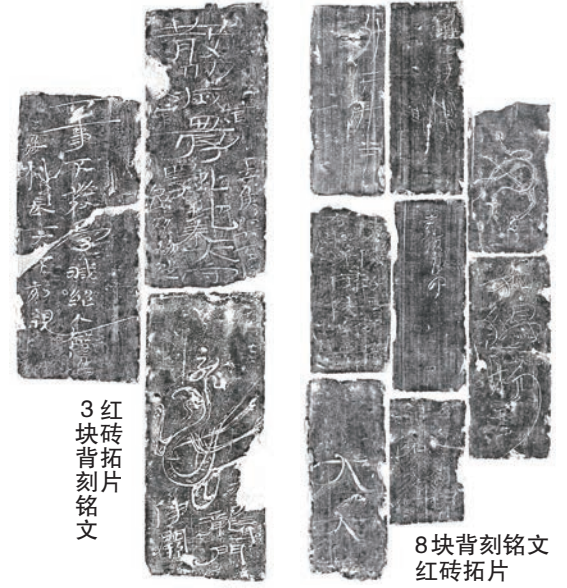


夏时期遗物（陶盆、甗腰、鬲足）



西周时期陶甗

西安国际港务区贺韶北村东汉墓地考古发掘收获



3 红砖背拓片铭文

8 块背刻铭文红砖拓片

2019 年 3～5 月，为配合中源国际汽港建设项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项目用地发现的 6 座东汉砖券多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丰富的考古收获。为研究东汉时期墓葬营建、家族丛葬及随葬用器等丧礼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发掘区域位于新筑街道贺韶北村东北（纺渭路东）、潘罗村西侧的塬地上，墓地东眺骊山，西濒灞水，距灞河流域下游约 6.8 千米，西南距新寺遗址（西汉长门宫建筑遗址）约 4.2 千米，属于西安市灞桥区古墓葬及古遗址分布范围，地势较为平坦开阔。

这 6 座墓葬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全长 17.05～24.2 米不等，深 4.55～6.2 米。墓葬结构皆系长斜坡墓道，墓道两侧壁带有单重或双重台阶，墓室以砖砌“前堂后室”或带左、右侧室为主，整体平面多似“十”字形，其构筑方式是先在墓道尽头凿挖拱顶土洞，而后向里呈“凸”字形挖掘出土洞室，最后再用条砖于土洞内根据规划所需营建各室。现存券顶和部分砖墙毁损，部分可能因盗洞盗扰。葬具人骨也基本不存，仅少量残颅骨、肢骨或棺钉位于后室或侧室。除 M1 位于墓地最东北处外，其余墓葬均集中分布于墓地西北部，以墓葬方向不同可以分为三组，其中 M1 和 M4 坐北朝南，M5 坐东朝西，M2、M3 和 M6 坐西朝东。

M1 M1 系“前堂后室”结构，方向 196 度。墓葬水平残长 18 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 0.3 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 6.2 米，由墓道、封门、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在前堂东、西两壁预设假室门，假室墓口内壁以“横砖侧立”砌筑有砖墙，以便需要时挖筑侧室。前堂墓顶西南角发现一椭圆形盗洞，开口于现地表，盗洞南北长约 2.9、东西宽 1.3～1.78 米，向下穿透墓顶进入墓室施盗。在前堂东北部近地面及后室地面清理发现有大面积厚约 0.5 厘米的草木灰迹及零星白灰层，在



M4

前堂填土及西南壁下残存有“五铢”铜钱及陶器残片等。推测墓主原应敛葬于后室，前堂主要用于放置随葬品。

M4 M4 为“前堂后室”带东侧室结构，方向 192 度。墓葬水平长约 19.66 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 0.6 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 5.1 米。墓道东壁近墓口凿设一小龛，内置一陶壶，口覆半砖。前堂地面残存有陶质生活日用明器 30 余件组，后室及东侧室填土清理有铜弩机与石握骨。在前堂西北角发现颅骨一具及东侧室内残存有下肢骨，前堂、后室地面清理发现有草木灰迹，推测墓主和随葬品放置位置与 M1 相同。

M5 M5 坐东朝西，带南侧室，方向 284 度。墓葬水平长约 17.05 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 0.6 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 4.9 米。前堂地面经清理残存有陶器、石握及玉剑髀等 40 余件组，随葬品摆放有序。

M2 M2、M3、和 M6 坐西朝东。M2 带北侧室，方向 102 度。墓葬水平长约 17.72 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 0.7 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 4.55 米。在前堂填土及墓底残存有“五铢”铜钱、铜环及陶案、碟、耳杯等少量器物。在后室发现墓主股骨残骸及铁钉锈渣。

M3 M3 南、北两侧室，方向 102 度。墓葬水平长约 24.2 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 0.65 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 5.3 米。甬道顶中部圆形盗洞直径约 0.8 米，开口于扰土层下，垂直向下穿透甬道顶进入墓室施盗。随葬品有数件陶碟、铜环首刀（柄）、铜钱及骨饰等数件随葬品。其中南侧室出土一件灰陶朱书镇墓解除瓶保存完整，倒置于地口朝东，瓶内淤土夹杂一块白色碎石，其应属刻意放置，疑为瓶身朱书所谓“精石”。

M6 M6 带南、北侧室，方向 106 度。墓葬水平长 17.9 米，墓道开口距现地表深约 0.6 米，墓底距现地表深约 5.2 米。北侧室西北角有盗洞。在后室中部南北两侧发现

朽木灰迹，应该为并列东西向放置木棺两副，木棺西宽东窄，北棺长约 1.86、宽 0.5～0.55 米，南棺长 1.66、宽 0.5～0.55 米，棺底铺垫有白灰渣，墓主骨骼腐朽不存。在前堂填土内清理有陶器残片及南侧室西南角残存陶罐一件。揭露墓底铺地砖时发现，北侧室前端中部有 3 块红砖背刻铭文，南侧室中部偏北有 8 块红砖背刻铭文，且铭文砖排列规律，刻铭有纪年及龙纹图案等。结合北侧室“永元三年”砖铭及南侧室“永元四年”砖铭可知，M6 系东汉中期早期墓葬，主体“前堂后室”结构营建或稍早，北侧室建造早于南侧室。

根据墓葬形制、模型明器和陶动物组合及随葬品特征初步判断，这 6 座墓葬系东汉中期家族丛葬墓地，虽遭盗扰破坏，但仍出土有陶、石、铜等质地文物 140 余件组。

本次发掘最重要发现是在 M6 侧室 11 块有刻铭铺地砖，砖背刻铭在汉墓发掘中少见，对于研究东汉晚期墓葬的葬制葬俗等具有重要意义。刻铭内容有“永元三年”“永元四年”“龙门伊阙”……事不发……灭绝人……利长……不……亲”“王侯以下……散而灭官……骨……此地奉守……移位”“弟”“不过前，……”“陵存弟守陵存血弟尊存血”“大……大”“斗二升半”及龙纹等图案，字体隶、行、草书兼有。龙纹图案在汉代多与升天观念相关，有的也有镇墓辟邪的作用。所以，在汉代墓葬中不论是墓壁中还是随葬器物中，经常会出现跟龙有关的纹饰或器物。此次发现的龙纹形象似腾飞捕猎状，身体呈细长弯曲的蛇形，嘴大张，整体造型简洁明快，生动活泼且动感十足。但因为单体形象出现未见仙官或墓主形象，升仙意味不明，且因为背刻铭砖，反铺于墓室底部，结合铭文内容来看，镇墓辟邪的意义更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执笔：苗轶飞 梁依倩 王海旭）

山东沂水发现细石器遗存



水泉峪遗址采集石制品

2022 年 3 月初至 6 月下旬，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组成联合调查队，在沂水县西部展开为期 4 个月的旧石器时代专项调查工作，共发现旧石器、细石器遗存 5 处。

其中以水泉峪遗址地层堆积厚，跨度时间长，考古学内涵最为丰富。基于地貌埋藏情况，经初步观察，该遗址文化堆积应涵盖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面貌体现出从打制石器到细石器的转换与发展。水泉峪遗址也是沂河上游区域首次发现的具有原地埋藏性质的细石器遗存。

水泉峪遗址位于沂水县崔家岭镇水泉子峪自然村北部。文化遗物出自沂河支流清源河与次级支流交汇处南部的山前阶地中。清源河南北两岸分布有一、二级河流阶地，其中 342 国道及其北邻镇政府与民居所在台地为一级阶地。二级阶地主要分布于清源河以南，除水泉峪遗址所在部分保留面积较大外，受河流侵蚀及 20 世纪 70 年代取土造田影响，其他区域则较少保留。水泉峪遗址所在二级阶地顶部海拔约 180 米，与清源河河面高差约 30 米，阶地表现出堆积清晰的二元结构，底砾层之下即为基岩，为典型的基座阶地。因遗址所在区域系民居及院落，开辟有羊圈、牛圈等设施，对地面改造颇大，因此阶地地面高低错落。同时，遗址南部可见依地势零散建造的民房，其间种植蔷薇梨果树。经勘查，在地表及清理断坎剖面均发现石制品。石料以石英为主，采自西部杏山岩脉之中。偶见灰白、黄褐、深红色等燧石制品，石料或来源于北部以花岗岩为主的山岭之中。该遗址面积较大，东西长约 200 米，南北长约 100 米。东部为较厚的土状堆积，西部石制品散布于杏山东坡，地层堆积极薄，大量石制品即采自基岩之上。与水泉峪隔河相望的北岸阶地中，也在清理剖面的过程中出土 2 件石英制品，其中 1 件为制作精良的端刮器。因遗址所依靠小丘当地人称为东疙瘩山，因此命名为东疙瘩山遗址。受清理深度所限（清理剖面不足 2 米），地层堆积与水泉峪遗址暂无法追索、对应。但据其所处清源河道相对位置，其文化遗物应出自同级阶地的下部堆积，时代应较水泉峪遗址为早。

结合地层堆积及采集、清理剖面出土的石制品情形来看，水泉峪遗址文化遗物出自二级阶地上部，厚度近 4 米。可见部分可划分为 5 个层次：①层为表土层，其下第②～⑤层均有石制品出土，暂未见动物化石；②层为红褐色粉砂质粘土，厚近 1 米，清理出土以船形石核为主，兼有拇指盖刮削器等典型细石器产品；③层为棕红色粘土，厚度不足 1 米，出土数量丰富的石英制品，暂未见细石器，其下第④、⑤层亦可见以白色石英为主要石料的打制石器，同样不见细石器；⑤层以下堆积情况暂不清楚。目前来看，水泉峪遗址第②层以下文化层暂未见细石器，仅发现以当地砂岩山体裂隙发育的脉石英为石料的石制品，推测年代应为早于本区细石器技术出现的阶段。因未见明显沉积间断，时代或存在连续关系。

水泉峪遗址发现后，调查队以此为中心展开进一步调查，先后发现旧石器地点 4 处。除东疙瘩山遗址外，在西距水泉峪遗址约 2.3 公里、3.8 公里处，同属于清源河南岸二级阶地地面及坡前地表均发现有石制品。前者采集以脉石英为主要原料的石制品 11 件，坡面散布大量脉石英石料，地层堆积十分稀薄，大多裸露基岩。后者发现地点 2 处，相距甚近，均位于吕公峪村北约 600 米，共采集到脉石英及燧石制品数十件，暂定为吕公峪 S1 和 S2。其中 S1 土层稀薄，无法深入工作；S2 堆积厚度约 3 至 4 米，可望搜寻到石制品的原生层位。通过调查工作可知，5 处旧石器遗存发现位置极为一致，均位于沂河支流和次级支流交汇处南部靠近山前的堆积，亦即清源河二级阶地后缘，埋藏环境相同，只是文化堆积保存状况差异很大。以水泉峪遗址、东疙瘩山遗址及吕公峪 S2 地点地层保存相对完好，其余 2 处不见地层或地层太薄。5 处遗存不论从所处环境还是石制品类型来看，均极为接近，应系相近地质时期的活动遗留。这也是本区旧石器遗存，尤其是晚更新世以来史前遗址埋藏的一个主要特点。

临沂素有“沂水、蒙阴七十二崮”之称。沂水县位于鲁东南低山丘陵区，以水泉峪遗址所在的县境西南部广泛发育石灰岩构造山体，分布有数量众多因流水侵蚀而塑造成顶部浑圆且周身陡峭的桌状山，地貌学谓之“方山”，俗称“崮”。此外，诸如如此的地名常带有“峪”“坪”“顶”“塆”等，如与沂水县临近的淄博市沂源县的北桃花坪遗址（即扁扁洞遗址），山西省朔州市的峙峪遗址等。这也是在本区开展旧石器调查工作所重点关注的一种地貌类型。

沂沭河流域发现的细石器遗存除了马陵山遗址群以外，以沂水县发现的数量为最多，据不完全统计有 20 余处，这其中又以宅科遗址最为重要，表现在采集石制品数量最多，器物类型最为丰富。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沂水县已知细石器工业的文化面貌。遗憾的是其石制品全为地表采集，并无地层依托，从而限制了其后续工作的开展。沂沭河流域尚未发现以船形石核为主要石核类型的原地埋藏遗存，因此水泉峪等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其年代数据尤为关键。华北地区以船形石核为主要细石核类型的遗存分布于多个省份，如河北、山西、河南、江苏等地，均有较为坚实的科学测年数据支撑。反观山东地区情况，采集发现的石核数量颇为可观，但因缺乏原生地层，无法开展测年工作，更无法探讨细石器技术在华北地区尤其是山东的传播路线和年代问题。对水泉峪遗址的后续发掘和研究工作，尤其是测年数据的取得，将很大程度上突破讨论上述学术问题的瓶颈。

更为重要的是，水泉峪遗址与跋山遗址相距约 10 公里。跋山遗址地层连续，堆积厚重，文化时代跨度大，是目前山东省内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初步的测年数据显示其年代为距今 6～10 万年。水泉峪遗址的年代很可能与跋山遗址的年代相衔接，亦或有所重叠。具体表现在二者相应层位出土的石制品，在石料采用上均以附近富集的脉石英为大宗，打制技术方面除了锤击产品较多以外，砸击技术的使用也颇为频繁。同时，就对石核的初步观察来看，都可见包括盘状石核在内的较为复杂的剥片产品。尤为引起注意的是，二者的埋藏层位极为接近。跋山遗址文化堆积处于沂河第二级阶地的中、下部，顶部堆积受后期侵蚀，并无保存。因此第①层即含有石制品，划归为第一文化层；第④层为底砾层，初步认为是古人类首次利用这一区域时所遗留下来的古地面，虽后期一定程度上受流水等自然营力改造，但仍大体保留文化遗物的原有位置及地面状态。底砾层之下即为古生代石灰岩基座。水泉峪遗址的文化遗物出自沂河支流清源河二级阶地上部，顶部稍有侵蚀但基本保持原有堆积性状。第②层中清理出细石器，也即该遗址的第一文化层，由此向下陆续清理出第二至第五文化层，表现出以白色石英为主要石料的，涵盖锤击、砸击技术的石器工业面貌。同时，几个层位虽可以含砂粒径大小加以区分，但形成过程及物源应与跋山遗址极为接近。如果沂河的二级阶地及其支流的二级阶地形成时代大致相同，那么水泉峪遗址的第二至第四文化层很可能与跋山遗址第一文化层存在相同的地质背景和形成时间。目前两处遗存的光释光样品均已系统采集，以上推测还需最终的年代数据加以验证。

沂水县目前已发现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南洼洞遗址和西水旺遗址，跋山遗址的测年数据指示其可以划归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以水泉峪遗址为代表的、具有原生地层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的发现，为我们下一步构建沂河上游区域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材料，也为开展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向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技术演变轨迹等课题研究创造了条件和可能。（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沂水县文化和旅游局 执笔：任雅鹏 李罡 尹纪亮 颜世全）